

懷念李國祁先生： 與李國祁先生交往中的二、三事

張玉法 中央研究院院士

李國祁先生是師大史地系的學長，比我早 5 年畢業，比我早 9 年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服務。1964 年我入近史所時，他已赴德國進修。1966 年李先生學成歸國期間，擬經美國返臺，傳言郭廷以所長要請他任副所長，引起幾位資深同仁的不滿，嗣以李先生自美回臺簽證發生問題，乃返回德國做研究。郭先生創所時期，只有臺大有歷史研究所，而且不培養近代史方面的研究生，而出國留學者很少回來，所以郭所長進用的人員幾乎都是大學畢業生。記得王萍女士在美國取得碩士學位來近史所工作，郭先生引以為榮，每有外國學者來，郭先生必特別介紹，說她是威斯康辛大學的碩士。郭先生非常希望能讓年輕同仁出國進修，故在爭取到福特基金資助近史所發展時，特別有一項是資助同仁出國進修。李先生是拿獎學金去德國進修的，而且拿到博士，自然受到郭先生的器重，但不為一些資深同仁所容。李先生留在德國做一段時間研究工作之後，獲聘為近史所副研究員，但升研究員時在所務會議被否決，後由院務會議通過。

李先生有領導能力，又喜歡做事，是火車頭型的人物。來近史所後即被借調到師大歷史研究所做所長。那時國科會想推動大型研究計畫，派人與李國祁先生等商談，因為郭所長所擬的近史所十二年發展計畫中有研究「中國近代化」的項目，李先生就以「中國近代化的區域研究，1860-1916」為題，找人參加。當時大學雖然開近代史課

程，但真正專心研究近代史的人很少，所以參加的主要還是近史所同仁。該計畫籌組期間，我正在做民國初年的政黨研究，心無旁騖。有一天，李國祁先生來我研究室，說：「我們的中國近代化區域研究計畫主要研究沿江沿海各省區的近代化，山東省還沒有人研究，你是山東人，參加我們的計畫如何？」我聽了學長的話，一時不知如何回答是好。我說：「我雖然是山東人，從小離開家，對山東一無所知，呂實強先生不是可以研究嗎？」他說：「呂先生要研究四川省，不研究山東省，其他同仁也沒有人要研究山東省；山東省很重要，這個計畫不能缺山東省。」我考慮了一下，只好答應。想不到這一答應，以後的歲月至少有一半都花在山東省的研究和史料搜集上。

這個計畫是近史所的第一個大型研究計畫，以前近史所同仁都是單打獨鬥，各研究各的。李國祁先生能夠說動一些同仁，組織10個人參加研究計畫是很不容易的事。這個計畫是國科會答應支持的，當時在國科會負責推動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的人員皆為社會科學家，他們總覺得前此歷史的研究都是堆資料、講故事，缺少理論架構，希望我們的計畫能借用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。理論架構、社會科學方法，以前總認為是社會科學家的事，現在要套在歷史學者的頭上，參加的同仁都戰戰兢兢，除了經常請政治學家、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來近史所講演外，還要看社會科學方面的書，張朋園先生甚至

去臺大旁聽費景漢先生的課。張先生聽了一學期，我問他：心得如何？他說：經濟方面的東西很難懂。這也許是客氣話，據我瞭解，在所有參與研究計畫的同仁中，張朋園先生閱讀社會科學方面的書最多，將社會科學理論用在歷史研究方面的也最多。

中國近代化的區域研究計畫共做了3年半，研究成果尚未整理出版，接下來就另擬計畫研究1916-1937年間沿江沿海各省區的近代化發展。在討論繼續組織計畫的時候，李國祁先生突然提議要換主持人，並指名由我主持。李先生的意見是：他是研究近代史的，所以1860-1916年這一段由他主持，我是研究現代史的，所以1916-1937年這一段應由我主持。其實那時我對現代史這個範圍才開始多所涉獵，談不上什麼研究，因為受李先生之邀在師大歷史研究所開中國現代史研究的課，不得不在這一方面多讀一些書。當時參加計畫的同仁我最資淺，有幾位是師大的學長，有幾位出身臺大，年齡也比我長，我實在不敢接這個擔子。不過，因為他們的主要研究志趣都在晚清這一段，又說我年輕，應該為大家跑腿，我也不便多說。那幾年坊間出版了不少有關現代化的書，用「近代化」一詞的漸少，在我的建議下，就將原計畫的名稱改為「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，1916-1937」。不意計畫做了1年，「中國近代化的區域研究」成果由海外院士劉廣京先生等審查完畢，他們的意見是：地方史做得太細，海外學者沒有耐心讀下去，

學術成就不易為人了解。建議我們改做全國性的現代化問題，譬如工業化、民主化。於是第二年計畫重擬，定名為「中國現代化的專題研究計畫」，仍是 10 人參加，各自提出自己的題目，做了兩年。我在計畫中做的是工業化，張朋園先生做的是民主化，後來都有專書出版，其他同仁的研究成果有無出版已記不清楚，至少都有論文發表。

我入近史所後，郭先生要我研究現代史，我原想從晚清社團研究起，向下研究民國建立後的政黨和政黨政治，被李國祁先生拉去研究山東省，卻從此對山東省的歷史發生興趣。為了蒐集民國人物記憶中的山東史料，還請求我讀中學時的楊校長出面，約集同好，創辦《山東文獻》季刊，我也參與編輯工作。辦了 28 年之後，山東文獻社同仁又結合兩岸學者修了一套《民國山東通志》。追憶前緣，就想起李國祁先生邀我參加研究計畫那一段話。

李先生不僅邀我參加研究計畫，在此之前即邀我去師大歷史研究所開課。李先生主持下的師大歷史研究所，在教學與研究上以近現代史為重點，張朋園、林明德先生等也都去開課。當時現代史是一個新興的課程，治安機關對這一方面的教學與著作甚為注意。不知是否因為受到有關方面的關切，有一天李先生來與我聊天。李先生說：「研究

與教學是兩回事，不一定要把研究出來的東西都告訴學生。」我說：「如果研究的成果不能告訴研究生，那辦研究所幹什麼？」李先生沒說什麼，就把話題轉到其他方面。我在師大歷史研究所兼課期間，李國祁先生受東華書局之邀，主持編印一套歷史叢書，李先生要我寫《中國現代史》，答應之後，我就把多年的講義整理出版。不意出版不久，傳說要查禁。李先生來找我，說我的書恐怕要大幅修改，我說：「我不知要改什麼，你如果有掛慮，我的書可以不放在歷史叢書內。」不久東華書局轉來治安單位的審查意見，我看了鬆了一口氣，不過是紀年和稱呼的問題，我據學術論著的常規答辯，至於有一個意見說：不可拿國民黨與共產黨比較。我答應把那一段刪掉。信由東華轉給治安機關以後，不久即雨過天晴。意料之中的，時在戒嚴時期，讀者喜歡讀禁書，因為傳言我的《中國現代史》要查禁，暢銷了好多年。回憶前緣，又想到李先生邀我去師大兼課、邀我寫《中國現代史》的情景。

李國祁先生作為史學界的火車頭，不僅拖著許多學生跑，也拖著史學界的一些朋友跑。有人跑了一段停止了或轉向了，我好像還是走在他所引導的路上。人生有許多路，走那一條路有意義，很難說，到目前為止，還是覺得滿愉快的，在此說一聲「謝謝」！